

# 漢學推手二十載——李亦園院士與蔣經國基金會

Twenty Years Promoting Chinese Studies: Prof. Li Yih-yuan  
and the Chiang Ching-kuo Foundation

耿立群 (Keng Li-chun) \*

李亦園院士為臺灣人類學界的資深長者，也是國際知名的人類學家，他是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第一屆畢業生，後留學美國哈佛大學。歷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及所長、臺大人類學系教授，並創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，198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。李院士的學術專長在臺灣南島民族、海外華僑、漢人社會與民間宗教儀式、中國西南少數民族、「氣」的醫學與文化等方面。

除了學術研究外，李院士長期執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，自1989年基金會創立，即擔任執行長，2001年轉任董事長迄今。今年適逢蔣經國基金會成立20週年，本刊特別安排專訪李院士，並將主軸定在李院士推廣國際漢學的經歷和貢獻上。

訪問時間：2009年4月8日

訪問地點：臺北市敦化南路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

訪問人：耿立群、廖箴

紀錄：耿立群



訪談後合影，由左至右為李亦園院士、耿立群組長、廖箴小姐

問：1957年李濟教授成立「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」，您在1963年被聘為委員，又曾兼任秘書，這段經歷與蔣經國基金會是否有經驗傳承的關係？

答：「中國東亞學術研究計畫委員會」簡稱東亞學會，成立於1957年，由哈佛燕京社出資，每年幾萬美金，在當時是很大的數額。當年薪水微薄，生活條件遠遠不及現在，所以東亞學會的補助，對學者而言，有一半是做為生活補貼，安定其生活來做研究；與現在的學術補助完全用於研究工作，是大不相同的。我早年受到李濟先生的教導與栽培，對他很感念。李濟先生是一位個性很強、很嚴肅的學者，令人敬畏，但他在主持東亞學會時，卻一再囑咐強調：「我們是給錢的單位，態度要非常低調，不能有傲氣，千萬不能讓受補助的學者有嗟來食的感覺。」後來我主持蔣經國基金會，一直秉持他這一遺教，也是採取這樣低調的態度。

除此，蔣經國基金會還承繼了東亞學會的另一經驗，就是補助主要考量申請學者過去的研究表現，只要

\* 作者為漢學研究中心編輯兼聯絡組組長。

認為是優秀可靠的學者，就給予補助。而一旦審核通過，便不計較他如何使用，不會雞毛蒜皮地區分多少額度是旅費，多少額度用於買書等等。即使研究計畫有變動，只要申請人略作說明，基金會都會同意，從不多加干預。這就是蔣經國基金會經營的最高原則——絕不官僚。

現在的行政機關往往規定太過瑣細嚴苛，例如曾有一位人品極佳、治校卓然的大學校長，僅因建築工程發包不出去而被記過，即明顯過於官僚僵化了。李濟先生雖然治學為人嚴謹，但在發放補助上，採取低調且寬鬆不計較細節的態度。東亞學會之後，於1959年有「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」（簡稱長科會，係國科會的前身）的成立，就是首先沿襲仿照東亞學會的補助模式，蔣經國基金會也是如此，所以可以說東亞學會對臺灣的學術補助制度，具有開創之功和極大的影響。

問：在您的生涯發展中，除了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及臺大、清大等大學擔任研究和教學工作外，1968年開始代理中研院總幹事，1970年出任民族所所長，1984年創建清大人文社會學院，並擔任首屆院長，1989年又開始掌理蔣經國基金會，可謂一直從事各種學術行政工作，這是一般學者很少有的經驗。學術研究與行政該如何兼顧？是相輔相成或互有抵觸？

答：基本上學術研究與行政多少會有扞格，因為行政工作總是佔用很多的時間。不過對人類學者而言，最忙的時日大約是在25歲到50歲之間，因為要出外做長期的田野。像我年輕時，曾在彰化農村住過一年，馬來西亞九個月，泰雅族南澳村前後有二年，但這些長期主要的田野都是在1968年以前做的。我於1968年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，研究上的田野工作已大抵完成，後期則只是零星地做一些補充性的短期田野，例如曾至沙撈越一個月，所以行政工作對我的田野工作而言，影響不算太大。

真正受影響的是撰寫論文，由於白天要處理行政，

論文多半利用晚上熬夜撰寫，這對健康大有損傷。2001年我因冠狀動脈阻塞做了繞道手術，究其原因，恐與那幾年太累有關。在那之前的三年間（1998-2001），我共寫了20篇論文。<sup>1</sup>而且大多是研討會主題演講的論文，一年平均有七篇；當時還在清華大學、中央研究院任職，再加上蔣經國基金會的工作，負擔極重。所以同時兼顧研究與行政，對我影響較大的應是晚期的研究，而非早期的田野，而其影響是無形的，造成身體健康的超負荷。

問：請問行政工作對研究有些什麼正面的效益嗎？

答：當然也是有的。譬如我在1970-1977年擔任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所長，從那時起民族所走上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整合的道路。臺灣社會科學各科的整合，可說是我和楊國樞教授帶動的，當時我們編了一部書——《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》，<sup>2</sup>上、下兩冊，將社會學、心理學、人類學等不同學科之深度研究方法併合在一起，至今二十幾年，仍為大學常用的教科書。而會有這樣的合作，便緣於當時我擔任所長之故。

再舉一例，1968年我代理中央研究院總幹事，當年沒有副院長，這是相當於副院長的職位。那時王世杰先生是院長，對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所長有點不便直接指揮，包括史語所的李濟所長、民族所的凌純聲所長、植物所的李先聞所長等，所以找年輕的我來代理總幹事（時年38歲），主要原因是李濟先生、凌純聲先生等都是我的老師，師生之間溝通比較容易。當時所長多半一做幾十年，年輕的研究員沒有晉升的機會，王院長一心想要改革，建立制度，囑我們去進行，我就和人事主任胡佛先生一起推動所長任期制。我們的規劃是所長三年一任，只能連任一次，不過先前不管做多久都算第一任，現在開始再做三年是第二任。我親自去和老所長們逐一溝通，例如我勸說李濟老師，年紀大了做所長太辛苦，有了任期制正好可以順勢交棒休息；之前他曾勸我接下代理總幹事一職，如今對我要推動的事便不好意思

1 詳見黃克武訪問，潘彥蓉紀錄，《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錄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05），附錄〈李亦園著作目錄（1952-2005）〉，頁591-593。

2 《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》由楊國樞、文崇一、吳聰賢、李亦園合編，由東華書局於1978年1月初版，2001年發行至第13版。該書上、下冊計分五編：緒論、研究的基本類型、測量程序與工具、蒐集資料的方法、資料分析與報告。

拒絕，於是中央研究院的所長任期制就這麼確立下來。其後不久，各大學也紛紛效法，建立了系主任和院長的任期制。

由上述兩例可知，身兼行政工作對自己的研究當然會有影響，但相對也較易於對整體學術發展有所貢獻。去（2008）年臺大 80 週年校慶，我獲頒榮譽博士學位，最主要的理由是我對社會科學現代化有重要的推動；楊國樞教授榮獲傑出校友，也是著眼於其學術改革。我們年輕時有一批好友，像楊國樞先生、胡佛先生等，對學術有較長遠宏觀的想法，也確實共同推動了一些較具建設性的學術革新，所以即使行政工作造成個人研究的一些小損失，也是值得的。我覺得從事行政工作，最重要的是關懷全體的心理，目前我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、評議員，每當開評議會時，各研究所所長難免偶有私心，基於各所本位發言立論，我通常則以整體的觀念來討論事情。因為中研院總體健全，各研究所自然也會有較好的發展。

問：1989 年蔣經國基金會成立，您是首任執行長，2001 年升任董事長迄今，請問蔣經國基金會的經營理念和重要任務為何？前十年與後十年又有什麼不同？

答：在蔣經國基金會工作，是我一生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。但一開始我並沒有擔任執行長的意願，因為我不擅交際，擔心無法勝任。只是當時沒有更合適的人選，我才勉強接任了執行長。

經營蔣經國基金會的前十年比較辛苦，因為要確立其學術形象。一般人對這個新創設的基金會不了解，初期常有老兵來基金會要錢，說他們早年為蔣經國總統做事而要求基金會回饋；這種事例還好處理。最困難的是蔣經國基金會的宗旨是純學術導向的，有些帶政治色彩的申請案便因此無法通過，難免得罪一些人，甚至有人向總統府告狀。所幸基金會的董事們，如錢復先生、毛高文先生、李煥先生等，都是明理之士，常設法為我們阻擋這些政治力的干擾。例如有一次，我收到一封來自美國中西部某州參議員的來信，敘及該州州立大學申請一個研究計畫，要求基金會務必補助，並限二週內答覆。於是我去找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復先生幫忙，他慨然同意寫信給該參議員，說明基金會的性質和運作方式，

順利解決了這件棘手的事。當時外國人總以為蔣經國基金會是為從事外交而設立的，殊不知我們創會的理念就是採取純學術取向，由臺灣出錢補助國外的漢學研究，藉用學術之力博取世人的好感，這是屬於「軟實力」的呈現，與正式外交的「硬實力」不同。

基金會的前十年，一方面是確立學術路線，一方面是被動的接受申請案，亦即只要是研究漢學、中華文化或臺灣的計畫，都可提出申請，基金會沒有偏好的主題，僅在審查上堅持其學術性。每年約有四百件申請案，能夠通過的不到一百件左右。這些都是由申請者依自己的興趣或需求提出的計畫，基金會並未有額外要求，或其他特殊的規定，這是初期的基本策略。

經過一番努力，基金會逐漸確立學術路線，建立了信譽後，第二個十年則開始較為主動的規劃一些研究議題，遂有所謂專案研究或委託研究的補助，也就是由基金會主導、推動一些有意義的研究。目前大部分的經費還是用於被動的申請案，而少部分的則是有既定目標的專案補助。

蔣經國基金會前後十年第二個不同點，在於臺灣研究方面。早期基金會常遭受一些帶有族群偏見的政治人物批評，認為臺灣研究所獲得的補助太少。這是很大的誤解，我自己就是臺灣研究早期的開拓者之一，當然不會排斥臺灣研究。事實上，早期臺灣研究就是比較少，歐洲的漢學家的研究大半以傳統的經典研究為主，著名的漢學大師如法國的沙畹（Edouard Chavannes, 1865-1918）、丹麥的高本漢（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, 1889-1978），以至於當代的馬悅然（Göran Malmqvist, 1924-）與許理和（Erik Zürcher, 1928-2008），都是以研究傳統的經典著名。在美國的區域研究，還是以大中華的文化社會為主，而我們早期都是被動的接受申請，所以臺灣研究的計畫自然較少。學術基本上不能揠苗助長，只能逐步緩慢地促進，而臺灣研究就在蔣經國基金會日積月累悉心的扶植下，於第二個十年開花結果了。補助金額從早期的百分之二十增長到現在的百分之三、四十，而歐洲慢慢地也逐漸重視臺灣研究。由於蔣經國基金會的資助，英國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（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, SOAS）有臺灣研究的碩士

班、德國杜賓根大學（University of Tübingen）設立了臺灣研究中心，美國的哈佛大學也有臺灣研究的獎學金，這都是蔣經國基金會細水長流深耕靜耘的結果，讓歐美學界逐漸了解臺灣，從學術的立場來看臺灣的發展——中華文化在另一種政治制度下的發展，也是很值得的。

問：從蔣經國基金會 20 年來對國際漢學的補助項目能否一窺國際上漢學研究重點的流變？歐洲、美洲、亞太地區有何異同？蔣經國基金會有無重點支持或推動的項目？20 年來印象最深刻的補助案是什麼？

答：歐美漢學的發展，我所見最大的轉變就是歐洲由古典的、純粹的漢學研究（Sinological Studies），慢慢地轉向為美國式的中國研究（Chinese Studies），亦即研究對象擴及至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。

蔣經國基金會推動的一個很重要的補助案，就是在海外成立了三個漢學中心。第一個是設在捷克的查理斯大學（Charles University），最大的目的是支持東歐的漢學研究。東歐國家研究經費較為缺乏，漢學研究的起步也較晚，所以基金會著意扶助他們，例如設立東歐年輕學者旅費補助，讓他們有機會至西歐法國、德國、英國等國家搜集資料，進而慢慢地熟悉漢學的領域；這個獎助花費不多，效益卻很大。

蔣經國基金會的第二個海外漢學中心是設在美國，原來在哥倫比亞大學，由王德威教授負責，他是一位非常優秀且能幹的學者。後來他轉至哈佛大學任教，該中心便隨之成爲一個校際（inter-university）的組織，以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爲中心，常推動補助美國的各種漢學學術會議等，成效卓著。

再者，我們在香港也設立另一個海外漢學中心，香港算不算海外？當然是一個問題，但是設立在香港中文大學的這個亞太漢學中心，主要是一方面資助香港的大學研究，另一方面也做爲和亞洲其他國家學術機構研究的媒介。

最近我們打算在匈牙利的國立羅蘭大學（Eotvos Lorand University）再設一個漢學中心，第一年已撥款補助，將視其成效再決定後續政策。國立羅蘭大學是以匈牙利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 Eotvos Lorand 命名。該校早期的東亞研究是以蒙古爲主，因爲他們自認爲是蒙

古的後代；蔣經國基金會逐步轉變了其研究方向，現今研究中華文化、漢語的學者已日益增多。

我個人最喜歡說給一般人聽的一個研究計畫，申請者來自於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（University of Bucharest），要將《論語》翻譯成羅馬尼亞文並正式出版，申請補助金額只有 1 萬 8 千美金。三年期滿的成果是一本厚厚的精裝書，我雖只看懂《論語》二字，內容一個字也不認得，但有此料想不到的機緣，以極有限的補助，便能將中華經典文化傳布給遙遠的彼邦，內心著實充滿歡喜。

另外，補助大英圖書館將敦煌資料廣泛蒐集並數位化，亦即「國際敦煌計畫案」（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, IDP），也是我很喜歡且影響很大的一個研究計畫，藉此促使我們和英國大英圖書館、大英博物館等建立了友好的關係。英國對我們甚爲尊重，我幾次出訪英國，都受到隆重的禮遇。例如去到大英博物館，其館長 Robert Anderson 先生親自接待導覽，引領我們參觀中國的藏品，這在該館是罕見的例子。

劍橋大學我去了兩次，第一次曾去拜訪大師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, 1900-1995）教授，他坐著輪椅帶我參觀，還展示他做學問整理的卡片，有好幾個櫃子。第二次去時他已過世，我特別到他的銅像下留影憑弔。其實不只英國，整個歐洲學界對蔣經國基金會的貢獻都有深刻感受，巴黎梭邦第四大學（University of Paris IV, the Sorbonne）也曾因此頒給我榮譽博士。印象最爲深刻的是 1996 年受邀赴瑞典參加諾貝爾獎頒獎典禮，那年是諾貝爾逝世百週年，邀請了全球 12 位國際學術文化界人士參加，東方民族只有我一人代表，這是極其榮耀的難得經驗。頒獎典禮後晚宴在斯德哥爾摩市政大廳舉行，三千位賓客雲集，坐定後瑞典國王、皇后在樂聲中帶領諾貝爾獎得主緩緩駕臨，聲勢逼人，令人難忘。

蔣經國基金會在美國，有許倬雲教授、余英時教授等重量級學者主持，尤其我們與「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」（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, ACLS）結盟，藉重其長遠的學術聲望，許多研討會都是共同主辦，同樣也普受學界的敬重及歡迎。

問：蔣經國基金會自 1997 年起與漢學研究中心合

作出版《漢學研究通訊》和《漢學研究》，想請您談談雙方的淵源及您對本中心的期許。

答：漢學研究中心成立於1981年，我從1986年起至2006年長期受聘為中心的指導委員，有一屆還被推選為主任委員，所以對它的發展有相當的了解。漢學中心和蔣經國基金會的宗旨相同，皆為推動國際漢學的發展與交流。漢學中心的「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」，是以個別學者為獎助對象，每年資助十幾位漢學家來臺灣做三個月至一年的研究，身分從教授至博士候選人都有。這個獎助案雖然每個月的研究補助金額不高，但搭配其他的服務，仍頗受好評，在國際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，並吸引了不少優秀的學者前來臺灣，或收集資料，或與臺灣的學界相互交流，是很有意義的事。這可算是一種學術外交，他們得到臺灣政府的獎助，不僅增進對臺灣的了解，也會對臺灣產生友好的情誼。這個獎助案的審查會，我多次受邀參加。

另外，漢學中心編印的兩份刊物——《漢學研究通訊》和《漢學研究》，水準都很高，前者是獲取國內外漢學界資訊的重要管道，發行世界各國，廣受重視與好評。後者刊載中國文史哲領域的論文和書評，學術評價很高。兩種刊物都對國際學術交流有其作用，但漢學中心的經費拮据，所以從1997年起，蔣經國基金會開始撥款挹注這兩種期刊。

至於由漢學中心主辦的學術研討會，與所學專業較為相關的，我大都會出席，包括1993年的「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」、1995年的「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」、1999年的「社會、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」等。其中「社會、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」是因我於1998年獲得行政院文化獎，文建會特別委託漢學中心承辦的，以我的研究領域訂定會議主題，國內外三十多位好友與學生參加會議宣讀論文，會後出版兩大冊論文集。<sup>3</sup> 所以我和漢學研究中心的淵源是很

深的，這些我在近史所的口述歷史訪問中也都曾提到。<sup>4</sup>

漢學中心這將近三十年來的努力和績效，是有目共睹的。我期望它能在政府的支持下，繼續為國內外的漢學界服務，很多業務都可加深加廣的去做，例如「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」案，若能多編預算，就能提高研究補助費，也能增加錄取名額，其收效自然更為宏大。另外或許也能考慮納入對大陸學者的獎助，增進兩岸學術的交流。因此我呼籲教育部對漢學研究中心應多編列預算，支持它推動國際學術文化的交流。

問：面對大陸的大國崛起，學術文化突飛猛進的發展，在全球已經成立孔子學院，您認為臺灣人文社會學界應如何因應？

答：現在大陸在全世界成立的孔子學院有兩百多個以上，都是以支持漢語教學為主，而蔣經國基金會是補助較有深度的漢學研究，所以到目前為止，二者並無衝突，甚至有互補的作用。但未來的發展則很難說，他們慢慢地應該也會轉變深化。單就漢語教學來說，大陸用簡體字，對我們會不會有什麼衝擊？是值得留意的。當然現在大陸學者本身，尤其是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先生，極力主張要改革文字，至少部分恢復繁體字。我們使用繁體字（現在易名為「正體字」），對大陸也造成威脅，未來該如何調合？是下一步中華文化研究的重大課題。簡體字的確有的簡化得沒有道理，比方說頭「髮」和「發」生用同一個「发」字，「麵」食和「面」子都作「面」，容易產生誤會。

其實不只孔子學院，現在歐美地區有一個現象，就是向蔣經國基金會申請補助的很多研究計畫，其主持人都是來自大陸的學者，相較之下，臺灣出身的學者比例大幅降低。自從臺灣經濟發達以後，學習文科的留學生願意留在美國發展的很少，甚至繼續治學的也銳減，這是基金會董事會的隱憂，然也莫可奈何。再以人口論，若我們假定一個社會人口的百分之一是優秀的頂尖人

3 上述研討會皆有論文集出版：《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上、下）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1994）；李亦園、王秋桂主編，《中國神話與傳說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上、下）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1996）；王秋桂、莊英章、陳中民主編，《社會、民族與文化展演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（上、下）（臺北：漢學研究中心，2001）。

4 詳見黃克武訪問，潘彥蓉紀錄，《李亦園先生訪問紀錄》，頁461-464。

物，則臺灣只有二十多萬人，而以大陸 13 億總人口數，頂尖者可高達一千多萬人，是我們的幾十倍，這是客觀形勢上遜於大陸之處。

不過臺灣也自有優勢，撇開政治意識不談，我們應把臺灣視為中華文化在另一種政治環境下的成果展現，我的老師陳紹馨教授曾有一篇著名文章〈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——臺灣〉，<sup>5</sup>即持此一觀點。臺灣的民間文化，即所謂的「小傳統」文化，就顯現出更強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，這正是臺灣的強項。大陸基於它本是中國文化本土，他們對經典文化，尤其是大傳統文化，有較強的研究。而在另一種政治環境下發展的臺灣文化，除了中華文化的共同性之外，更有其獨特性，針對此一獨特的發展觀察研究，極具學術意義；尤其是根柢堅強的民間文化之研究，更值得倡議推展。

我長年來關注民間文化研究，這點亦頗受大陸學界重視。例如貴州的一位學者石峰，曾撰文討論我的研究，在〈論李亦園人類學研究的二重傾向〉一文中，他先回顧西方人類學學術簡史，著眼於人類學究竟是「科學」還是「人文學」。一般認為「科學」追求的是普遍性和整體性，而「人文學」則追求具體性和獨特性。他指出我在學術實踐中表現出「科學」與「人文」的二重傾向，亦即將科學追求通則，與人文重視個例二者併合，理出一套基本原則。前者他以我建立的「三層次均衡和諧」理論模型為例，他說：「李亦園先生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中『大傳統』和『小傳統』的深入研究，發現中國文化的基本法則是對和諧與均衡的追求，即人與自然、人與社會、人與自我的和諧與均衡，也就是『大傳統』的經典文本《中庸》所說的『致中和』的境界。」後者則以我提出的「文化的主體展演」做闡述：「人是文化的主體，他在展演文化所給的指令。文化是一個規則在那裡，發給人指令，但是人不一定服從它。有一些服從，有一些不服從，有一些因為服從而有所改變，因

此才有變遷，才有傳統。」最後他指出「李先生眼中的人類學『通則』與『個例』並不是完全對立的，因為人類學『又是科學又是人文』。」<sup>6</sup>

所以我認為臺灣的學術研究，一方面可著重於小傳統，另一方面將科學與人文整合兼融，較能突顯我們的特色，以與大陸的學術研究互相媲美，而不至於被湮沒。

問：您對漢學的未來發展有什麼看法？

答：就長遠來看，我認為海峽兩岸不應採取敵對的立場，最少應保持某種程度的來往交流。臺灣的經濟今年下半年會漸趨好轉，也是因與大陸互動良好有關。做為人類學者，視野常較為寬廣。回顧人類社會，從原始初期兩個蕞爾小族群為了爭奪獵區大動干戈，直到 20 世紀兩次世界大戰，大族群、大國家之間的衝突爭戰更迭不止。而今人們終於體認到社群、國家之間應共同合作、互補有無，才是人類該走的道路，所以歐洲在 1993 年有歐洲聯盟（European Union, EU）的組織出現。德國和法國從前是世仇，現在則一變成爲歐盟成立關鍵性的重要盟國，其間的轉折存有歐洲哲學家的思考和影響。美洲也有類似的發展趨向。亞洲方面東協（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, ASEAN）也逐步形成，若再加上中、日、韓三大國，東亞也隱然可視爲一個聯盟；臺灣實不能自我封閉，自外於這種國際趨勢。

在全球化的過程中，世人已普遍認知不能再用蠻荒時期的掠奪爭戰，相互合作才是正途。從大區域的共同合作漸次發展到全球的合作，此即我所謂的和諧均衡之道。中國傳統文化，不論是儒家或道家，都講究人與自然、社會間的和諧均衡，不像歐洲文化對自然採取極端的開發利用。未來人類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該何去何從，中國文化的此種特質應可帶給世人一些啓發，也算是對人類文明的貢獻。我希望蔣經國基金會未來能在東西方文化學術交流上，成功扮演溝通中介的角色。

5 陳紹馨，〈中國社會文化研究的實驗室——臺灣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》22 期（1966），頁 1-14。

6 石峰，〈論李亦園人類學研究的二重傾向〉，《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2000.4：34-39。